

# 第十次危機與重大轉型（2013–2018年）

## 溫鐵軍科研團隊

### 概述

中國經濟增長在2013年跌到7%、2014年跌到6%的增長率區間之後，連續5年保持低迷。如此持續低迷前所未有。

這次危機起因在於2012年全球需求下跌引發中國陷入輸入型通貨緊縮；輔助性因素是2013年面對GDP下滑仍然採取「順週期」的思路；爆發在2015年夏季的「股市暴跌」和年底的「匯市暴跌」；隨之是資金轉向房地產投機造成2016–18年的房地產泡沫化，是為本次危機的延續。直到2017年中央政府終於選擇了「逆週期」性質的「鄉村振興戰略」來構建危機軟著陸基礎的「壓艙石」之際，GDP增速已經連續5年跌掉了三分之一。

雖然多方對2019年經濟增長的預測仍未見起色，但，我們對很多人聽不懂的鄉村振興戰略還是寄予多種期望。

首先，這是政府應對全球化危機從順週期向逆週期做出的積極變化：一是能夠有效化解國有部門為主的龐大製造業的「生產過剩危機」；二是能夠體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通過自然資源的貨幣化和「生態經濟的資本深化」來吸納因貿易盈餘和國外資本流入造成過量增發的貨幣所形成的危機——金融資本過剩壓力下納入全球金融化——的制度代價。

其次，這是中國要改出以西方現代化為目標的發展主義道路的正面努力，通過讓「美麗鄉村」來承載「美麗中國」，使整個國家向「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包容性可持續發展做漸進式調整，最終是要完成生態文明為目標的國家發展戰略全面轉型。

但是，恰在中國開始對鄉村振興、扶貧攻堅、生態文明等新的戰略方向做重大轉型之際，美國也開始了重大轉型——為了本國虛擬化金融資本經濟向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的回調而突然在2018年夏季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

美國和中國都是在應對危機挑戰，都試圖推進戰略轉型；雖然可以「無問東西」，但卻正在從過去的「戰略互補」轉向現在的「戰略對撞」，這個大變局給21世紀已經全面衰退而又危機四伏的世界帶來更加複雜的趨勢……

### 第十次危機的特徵：綜合性與順延性

與新中國過去發生過的九次危機比較，這第十次危機，具備了過去所有危機的特徵，但同時又有處於特殊歷史時刻的特徵。

首先，它與第2–4次危機類似，也是與國家綜合安全相關的危機。

中國作為通過革命戰爭建立起來的後進發展中國家，建國之初即以革命的名義把沒收的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全部財產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國有資產。從此，為了堅持自主發展道路、以體現相對完整的國家主權，而多次遭單極霸權以世界主要投資國身份推出的、要求在根本上改變國家性質的「制裁」、「懲罰」。

此前分別是：1960年代中國接受蘇聯投資援助不到十年便面臨後者全面撤資的打擊，其後被迫走上艱辛的自力更生發展策略之路，客觀上也實現了中國第一次徹底的「去依附」；1970年代初開始，中國再次引進外資，尤其是在1990年代後全面投身全球化，客觀上形成產業資本的「再依附」。

當前，中國開放接受西方資本40年、並全方位融入全球化貿易20年後，仍然被掌握主要國際制度權的美國以「貿易戰」的名義威脅對中國實施各種懲罰制裁。表面上，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理由是中美間長期存在龐大貿易順差，以及美方譴責中國強迫技術轉移、竊取商業機密等基本沒有實證的指控；何況，技術本來就是可以市場交易的產品；美國在中國做投資甚至霸道地拒絕支付技術和品牌等無形資產。但，無論中國如何表示願意大幅削減美中貿易逆差，以及承諾加速開放金融市場，美國頂層精英並沒有偃旗收兵之意。因為，美國的貿易赤字不會有重大改善，而製造業也不會因此而大規模回流美國（這是美國的結構性問題，已經被2018年底美國貿易逆差擴大所證明），美國企業和消費者不會因此而得益。

誠然，中美貿易戰表面上只是重塑全球產業鏈佈局，實質上試圖憑借其單極霸權地位把中國踢出以美國為核心的全球產業結構之外。其戰略目的，與奧巴馬時期倡導的TPP一致，同樣是通過重塑貿易規則，威脅把通過WTO而被納入全球貿易體系的中國排斥其外。

而中國在產業及資本雙重過剩的危機條件下，先是於2015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旨在通過對周邊國家「互聯互通」，以本國之工業產能及資本補周邊欠發達國家的基本建設之短板，同時推動人民幣區域國際化，並輸出中國的工業體系及技術標準。但無論中國如何強調一帶一路倡議是雙贏共榮的戰略，它的地理覆蓋本身便無可避免被傳統核心霸權國視為對其自身地緣利益的挑戰。早在全面發動貿易戰前，美國政府便極力抵制及抹黑一帶一路，並告誡盟友不要參與其事。稍後更把新一代信息網絡5G建設視為軍事與國家安全基建一部分，並拉攏盟友排斥中國，甚至以立法方式禁止選用中國的電信企業與技術標準。昔日美歐科技猶領先世界時，西方世界絕不會接受發展中國家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輸入美歐技術和標準。然而當西方在國際的科技競爭中再無法取得絕對領先地位時，便以亂搬龍門的方式輸打贏要。

事實上，回顧中國被納入全球化體系，跨國資本（尤其是美國資本）及部分中國資本精英階層乃是最大得益者。中國以生態環境惡化及大規模提取剩餘勞動價值為代價，確實換取了可觀的發展。但中國的產業結構，尤其是高新科技產業，仍然高度依附先進國。佔有中國產業鏈上整體附加值最大份額的，仍然是外國跨國企業。

換言之，中國的產業資本經濟仍然具有高度依附性質。然而，中國政府仍然在金融資本領域堅持一定程度的經濟主權，也由此引起追求更高回報率的外國金融資本不滿。

與此同時，中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是希望利用中國體制的相對優勢盡快掌握核心技術，擺脫產業依附的局面，並在高新產業領域躋身全球競爭前列，促進產業升級，也是說試圖實現一定程度的產業去依附。

在此關鍵的歷史轉折時刻，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實質上是給中國兩個選項：要麼更大程度更全面加深中國經濟對美國的依附性（即美方強調的結構性改革；但作為導致全球貿易失衡的最大債務國，卻沒有國家可以要求美國本身作結構性改革），否則面臨被排除於另起爐灶的新貿易體系之外的懲罰。諷刺的是，當年美國積極把中國納入世貿，並相信中國不僅在經濟而且在社會政治方面都將因為入世而走上美國樂見的發展方向。然而20年後發覺中國還在多個領域堅持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對此，美國又想撕破條約，推倒重來。美國2018年度發表《中國履行加入世貿組織承諾情況報告》，認為WTO的內部機制已經無法對付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因此美國建議各發達國家另起爐灶，重建一套排斥中國的貿易規則。

總之，美國的頂層精英不分黨派已經一致視中國為美國的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在各個領域以種種方式遏制中國業已成為共識，差別只在於主政者或明或暗的個人政治風格而已。

其次，第十次危機也是前一輪第九次危機的伸延。

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引發全球性衰退，中國面對的是繼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造成外需下降引起第一次典型的生產過剩之後，再度發生的第二次外需下降、持續低迷引起的「第二次生產過剩危機」。

此外，中國也面臨因內部生產過剩資本析出實體經濟並流入投機性部門而引發的資產泡沫及去工業化危機。經濟增速拾級而下已是公認的事實，如何避免經濟斷崖式下滑並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爆發，是當前最大挑戰；化危為機，在於怎樣突破核心技術（芯片等）仍然被先進國掌握的局面，成功推動以5G、AI、物聯網、自動化等技術創新為核心的產業升級，脫虛返實；而且，面對劇烈的國際競爭，如何一方面減稅降負，改善及加強企業尤其是中小型企業的生存及競爭力，但同時避免加劇政府財政赤字引致的問題，兩者的損益點不易把握。更重要的是如何令全體國民更均等地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全方位釋放內需而不是被房地產、金融等部門擠壓國民消費力。這需要制約與層層權力關係複雜錯綜的龐大利益集團。更何況，數十年來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主義，也帶來生態環境嚴重破壞、貧富懸殊、勞資衝突惡化及整體社會道德風險上升等嚴重威脅社會穩定的連串矛盾。

簡言之，正在開展中的第十次危機將是一次內外因素疊加的綜合全面性危機。中國要同時面對多種重要關係的挑戰：國際與國內、中央與地方、金融與實體、經濟與社會等。作為最外部約束變量的世界局勢更是錯綜複雜，事態變幻莫測。

## **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村生態及文化資產價值顯化**

2013年形成的中國新一屆政府在2016年提出了農業供給側改革，接著在2017年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政府開始從幾個方向上做出調整。

- 第一，改變了過去加快城市化的發展思路，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 第二，明確指出鄉村振興是21世紀中國發展內涵最豐富的領域；
- 第三，明確強調放棄數量型增長轉為綠色增長方式。

儘管這三條仍然有局限性，在話語上沒有徹底改變，但畢竟目光轉向了內部的鄉土中國，再一次強調鄉村的作用。這次農村能不能再救中國經濟？在第十次危機中人們思考這沈重的問題時應該保持審慎樂觀。

中國目前的M2/GDP達200%，乃全球最高水平。但我們不能簡單據此判斷中國經濟必然走向不穩。中國對比其他先進經濟體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就是在農村地區有大量資產還沒有進行定價，或者其資產價值未顯化。城市資本全面過剩，迫切需要尋找被資本化的資源，城市資本下鄉已經無法阻擋，這也有助於扭轉農村長期以來資金要素淨流出的趨勢。在生態及文化資源資本化過程中，集體經濟組織起關鍵作用。配合國家的生態文明及鄉村振興策略，農村社區集體經濟作為主體能有效把具有生態及文化內涵的資產價值顯化。通過生態及文化資源價值實現形式的制度創新，使其變成吸納貨幣的可交易資產，能有效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以良性方式更多流入農村。進而實現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要素的在地化和有效回流，實現基於在地城鎮化的鄉村振興。一方面能夠用金融代替財政，緩解地方財政在負債壓力下加大對生態建設方面的投入壓力；另一方面，通過把預期收益高於基金投資的可持續生態產品推上市場，將城市的過剩流動性引入農村，促進農村生態及文化資產增值和農民財產性增收。增量收益能成為集體經濟組織擴大再生產，以及村社集體提供公共服務、改善鄉村治理，進一步增加區域總地租的經濟基礎。

只要有關的制度創新安排恰當，廣泛農村的文化和生態資源價值化實現，則182萬億的廣義貨幣存量水平絕非過高，興許猶有不及。

農民及農村的主體活躍性吸納過量增發的貨幣供應，在新中國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新中國的第一次危機，及其後1978年的農村土地承包制改革，客觀上發生的正是這個過程。這是本研究團隊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億萬農民救中國」的主旨。經歷全球化及激進金融化後中國的巨額M2存量堰塞湖，究竟會無處宣洩、洶湧出資產泡沫洪流，最終淹沒國民經濟，還是成功促進中國經濟及社會優化轉型，朝向真正的生態文明？其關鍵在於鄉村振興策略是否能貫徹落實。

在後全球化時代，中國面臨產能及資本雙重過剩，資本及政治精英自然有巨大衝動想走出去。這原本是資本主義的規律，本來沒有錯誤，但無奈國際形勢已出現大轉向。經歷數十年的全球化及新自由主義，世界各地的社會及生態系統均出現反作用（或波蘭尼所謂的雙重運動）。與此同時，雖然中國資本走出去的策略，還是求發展機遇，而非求稱霸，無奈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現霸權無法擺脫修昔底德陷阱的意識型態。像中國這種體量巨大的國家，其任何動向無可避免會被判斷為侵犯了現存霸權的地緣及幣緣勢力覆蓋。在後全球化年代，走出去的策略面臨的將是新冷戰的惡性競爭。雖然我們無須走向孤立鎖國的另一極端，但充份利用中國作為大陸型國家的廣闊戰略縱深，轉化城鄉、地域及收入差距為內在的發展勢能，深挖壕，廣積糧，修內功，無疑是令中國立於不敗之地的另一條腿。在國際形勢日趨複雜凶險的後全球化時代，沒有兩條腿的戰略，恐怕只會踉蹌跌碰。

如果中國能夠貫徹落實鄉村振興，不偏離生態文明的大戰略方向，也許中國仍然能夠有應對全球危機爆發的基礎。